

《辽史·高丽传》考证

魏志江

在历代正史中，《辽史》以其简略疏漏，向为史家诟议。其卷一一五《高丽传》记辽丽关系事亦多疏略，且舛误颇多。现笔者对《辽史·高丽传》略加考证，不当之处，幸祈教正。

一、“自太祖皇帝神册间，高丽遣使进宝剑”。

按：据《辽史》卷一《太祖纪上》载：太祖元年（907年），耶律阿保机“燔柴告天，即皇帝位”。太祖九年（915年）“冬十月……高丽遣使进宝剑，吴越王钱镠遣滕彦休来贡”。此“高丽”当为“泰封”之误。据《朝鲜史略》载，903年，弓裔建立泰封国，至918年6月，泰封国侍中王建发动政变，夺取政权，改国号为“高丽”，故其时进宝剑者当为泰封国使者。又，辽太祖建元神册在916年，泰封国进宝剑事则在建元“神册”前之太祖九年，本传作“神册间”，误。又据《辽史·太祖本纪》，神册三年（918年）“二月……渤海、高丽、回鹘、阻卜、党项及幽、镇、定、魏、潞等州各遣使来贡”，故知“神册间”，泰封国（本传仍误为“高丽”）再次遣使进贡。

二、“太宗天显二年，来贡”。

按：《辽史·太宗纪》不载。考郑麟趾《高丽史》卷一载：高丽太祖王建天授十年（辽天显二年，927年）“是岁，遣林彦如唐”，亦无遣使契丹进贡之事。唯同书卷一又载：天授五年（辽天赞元年，922年）“契丹来遗橐驼及氈”。是为《高丽史》首次

记辽丽交往事。然高丽太祖王建始终对契丹存有戒心，乃至其临终亲授《训要》谓：“契丹是禽兽之国，风俗不同，言语亦异，衣冠制度慎勿效焉。”（《高丽史》卷二）另考《东国通鉴》、《辽史拾遗》及《契丹国志》诸书，均不载天显二年高丽进贡一事，故此说待考。

三、“圣宗统和三年秋七月，诏诸道各完戎器，以备东征高丽”。

按：《辽史》卷十《圣宗纪一》载：统和元年（九八三年）冬十月“上将征高丽，亲阅东京留守耶律末只所总兵马”。关于征高丽的原因，《辽史》不详。今考《高丽史》卷二载：太祖天授廿五年（辽会同五年，942年）“契丹遣使来遗橐驼五十匹。王以契丹尝与渤海连和，忽生疑贰，背盟殄灭，以此无道，不足远结为邻。遂绝交聘，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岛，系橐驼万夫桥下，皆饿死”。盖高丽绝契丹使，是为辽丽交恶的开始。自惠宗大王武即位至成宗大王治十二年（辽统和十一年，993年）高丽绝不通契丹者达五十二年。其次，契丹与渤海国为世仇，据《高丽史》卷一太祖王建八年（907年）秋九月庚子载：“渤海……与契丹世仇。至是，契丹主谓左右曰：‘世仇未雪，岂宜安处！’乃大举攻渤海。”是年，契丹灭渤海国，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众投附高丽，《高丽史》卷二载：太祖十七年（辽天显九年，934年）

“秋七月，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众数万来投，赐姓名王继，附之宗籍，特授元甫守白州以奉其祀，赐僚佐爵、军士田宅有差”。高丽对渤海遗民的厚遇自然也要引起契丹的忌恨。此外，宋太宗雍熙三年（辽统和四年，986年），宋太宗为兴师伐辽，遣监察御史韩国华使高丽，约高丽联合发兵，夹击契丹。《宋史》卷四八七《高丽传》载：〔雍熙〕“二年，出师北伐，以其国接契丹境，常为所侵，遣监察御史韩国华赍诏谕之曰：‘……今已董齐师旅，殄灭妖氛。惟王久慕华风，素怀明略，效忠纯之节，抚礼

义之邦。而接彼边疆，罹于蚕毒，舒泄积愤，其在兹乎！可申戒师徒，迭相犄角，协比邻国，同力荡平。’……乃命发兵西会。”尽管宋丽结盟因高丽并未履约出兵而失败，然契丹已将其视作敌国，并以高丽与宋结盟作为其出兵的借口，《高丽史》卷九十四《徐熙传》载：“〔萧〕逊宁语熙曰：‘汝国兴新罗地。高句丽之地，我所有也，而汝侵蚀之。又与我连壤而越海事宋，故有今日之师。若割地以献而修朝聘，可无事矣。’”因此，为了臣服高丽，以解除其侵宋的后顾之忧，辽圣宗遂决定东征高丽。

四、〔三年〕“八月，以辽泽沮洳，罢师”。

按：辽泽，即大辽河及其支流的总称。据杜佑《通典》卷一八六载：“大辽水，源出靺鞨国西南山，南流至安市。”张楚金《翰苑》亦载：“其水阔百余步，平流清深，又多湾潭枝派，两岸生长柳蒙密，可藏兵马。两畔弥平，总名辽泽。”又，曹廷杰《东北边防辑要》卷上云：“唐贞观十九年（645年），亲征高丽，攻安市城，不克。引还至辽东，渡辽水，辽泽泥淖不通，命长孙无忌剪草填道，至浦沟，驻马督填道诸军，渡渤错水，暴风雪，士卒沾湿多死者。浦沟、渤错水，皆在辽泽中也。”故辽泽沮洳，士卒不得进，辽圣宗不得不罢师。

五、〔统和〕“十年，以东京留守萧恒德伐高丽”。

按：萧恒德，《辽史》卷八八有传，其记载伐高丽事云：“恒德，字逊宁，有胆略而善谋……为东京留守……时高丽未附，恒德受诏，率兵拔其边城。王治惧，上表请降。”又，《辽史》卷八五《萧挾凛传》称：“十一年（993年），与东京留守萧恒德伐高丽，破之。高丽称臣奉贡。”对于契丹的大举进攻，高丽竟毫无戒备。据《高丽史》卷三载：成宗大王治十二年（辽统和十一年），“夏五月，西北界女真报契丹谋举兵来侵。朝议谓给我，不以为备”，“是月，复报契丹兵至，始知事急，分遣诸道兵马齐正使”。“冬十月，以侍中朴良柔为上军使、内史侍郎

徐熙为中军使，门下侍郎崔亮为下军使，军于北界，以御契丹”。由于仓促应战，契丹攻陷边城蓬山郡等地。同书卷三又载：“闰月丁亥，幸西京，进次安北府，闻契丹萧逊宁攻破蓬山郡……乃还。遣徐熙请和，逊宁罢兵。”

六、“十一年，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请罪，诏取女真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”。

按：《高丽史》卷三载：成宗十三年（辽统和十二年，994年）春二月，契丹统帅萧恒德（逊宁）致书高丽成宗大王治，提出“以安北府（今朝鲜安州）至鸭绿江东计二百八十里，……併令筑城”，俾使“交通车马，长开贡覲之途，永奉朝廷”。同年夏四月，高丽王治“遣侍中朴良柔奉表如契丹，告行正朔，乞还俘口”，并“行契丹统和年号”。据此，高丽朴良柔使辽，应在辽统和十二年，《辽史》误。又据《高丽史》卷三载：成宗十四年（辽统和十三年，995年）先后“遣李周禎如契丹献方物，又进鹰”，“遣李知白如契丹献方物”，还遣派“童子十人于契丹习其语”。于是，高丽对契丹确立起朝贡关系，直至辽亡。宋人徐兢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谓：“淳化六年（995年），契丹攻之，治畏懦无守，臣事北虏”，契丹第一次侵伐高丽，终于达到了其迫使高丽“称臣奉贡”的目的。为了宠络高丽，以解除其侵宋的后顾之忧，《高丽史》卷三又载：成宗十三年，“是岁，契丹遣崇禄卿萧述管、御史大夫李浣等赍诏来抚谕”，又“诏取女真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”。唯《辽史》卷十三《圣宗纪四》作“诏取女真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”，无“国”字。考女真建国在辽天祚帝天庆五年（1155年），国号“大金”。辽圣宗统和十一年（993年），女真尚未建国，故《本传》“国”字疑衍。又，“鸭绿江东数百里地”，约指当于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一带地方。高丽既得江东地，遂筑城防守，以御契丹。其所筑城池，据《高丽史》卷八二载，主要有郭州（今朝鲜郭山）、龟州（今朝鲜龟

城)、宣州(即通州,今朝鲜宣川西北东林)、长兴镇、归化镇、兴化镇(灵州)和安义镇等。

七、〔十三年〕“十一月,遣使册治为王”。

按:遣使册治为高丽国王事,《辽史·本传》及卷十三《圣宗纪四》皆作“统和十三年”。《高丽史》卷三则载为成宗大王治十五年(辽统和十四年,996年)。史称:“春三月,契丹遣翰林学士张幹,忠正军节度使萧熟葛来册王曰:‘……册尔为开府仪同三司,尚书令、高丽国王。’”与《辽史》相差一年,盖辽自统和十三年十一月遣使,至次年三月抵高丽册封,故年次稍差,《辽史》、《高丽史》均不误也。

八、“十四年,王治表乞为婚姻,以东京留守、驸马萧恒德女下嫁之”。

按:《辽史》卷十三《圣宗纪四》载:统和十四年“三月壬寅,高丽王治表乞为婚,许以东京留守、驸马萧恒德女下嫁之”。同书卷八八《萧恒德传》载:“统和元年,尚越国公主,拜驸马都尉,迁南面林牙。从宣徽使耶律阿没里征高丽还,改北面林牙……为东京留守……子,匹敌”。未载其有女併下嫁高丽国王事。然据《高丽史》卷三亦载:成宗大王治十四年“遣左承宣赵之遴如契丹请婚,以东京留守、驸马萧恒德女许嫁”。同书卷三又载,成宗治薨于十六年(辽统和十五年,997年),同年,穆宗大王诵即位,次年四月,“契丹以前王薨,敕还纳币之物”。故萧恒德女仅为“许嫁”而已,毕沅《续资治通鉴》已辨之,故《辽史》本传当补一“许”字为宜。

九、〔十四年〕“六月,遣使来问起居。自是,至者无时”。

按:自辽圣宗统和十二年(高丽成宗十三年)起,高丽数遣使至契丹纳币朝贡,契丹亦遣使高丽册封,或互贺正旦、生辰、吊祭、会葬等,双方往来不绝。关于辽丽交聘事,张亮采先生有《补辽史交聘表》,韩国学者金渭显《契丹的东北政策》附录亦

载有辽丽交聘年表，可参阅。唯《辽史》本传称：“〔统〕和十五年，韩彦敬来纳聘币，吊驸马萧恒德妻越国公主薨”。“韩彦敬”，《高丽史》作“韩彦卿”。据《高丽史》卷三载：成宗十五年（辽统和十四年，996年）“遣韩彦卿如契丹纳币”。两者音近形讹，当为一人。又，辽圣宗统和十五年为高丽成宗六年（997年），两书记载相差一年，未审孰是，俟考。

十、〔十五年〕“十一月，治薨，其侄诵遣王同颖来告。十二月，遣使致祭，诏其侄诵权知国事。十六年，遣使册诵为王”。

按：据《高丽史》卷三载：“穆宗宣让大王讳诵，一字孝伸……（成宗）十六年十月戊午，受内禅即位。十一月，遣阁门使王同颖如契丹告嗣位”。又载：“十二月……契丹遣千牛卫大将军耶律迪烈来贺千秋节。王迎命，告于成宗枢前”。考《高丽史》卷三，契丹先后于穆宗二年（辽统和十七年，999年）和十年（辽统和廿五年，1007年）两次遣使高丽册封。如穆宗大王诵二年“契丹遣右常侍刘绩来加册王尚书令”。十年“春二月，契丹遣耶律延贵来加册王为守义保邦推诚奉圣功臣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守尚书令兼政事令、上柱国、食邑七千户、食实封七百户”，未载辽统和十六年遣使册诵为高丽国王之事。唯《辽史》卷十四《圣宗纪五》载：统和十六年“冬十月，遣使册高丽国王诵”，与《本传》同。

十一、“二十年，诵遣使贺伐宋之捷。七月，来贡本国《地里图》”。

按：《辽史》卷十四《圣宗纪五》载：统和廿年“二月丁丑，……高丽遣使贺伐宋捷”。又载：“秋七月……辛丑，高丽遣使来贡本国《地里图》”。所谓“伐宋之捷”，据《宋史》卷四四六《康保裔传》及拙文《康保裔“阵亡”说再辨》（《北京师院学报1986年第二期》，盖指宋咸平二年（辽统和十七年，

999年)九月,辽军南侵宋,攻遂城,不克。又遣萧继远攻狼山镇石砦,破之。次瀛州,与宋军战,擒宋将康保裔、宋顺,获兵仗、器甲无算。辽军大胜。

十二、“二十二年,以南伐事诏谕之。二十三年,高丽闻与宋和,遣使来贺”。

按:《辽史》卷十四《圣宗纪五》载:统和廿二年《宋景德元年、高丽穆宗大王诵七年,1004年)“九月己丑,以南伐谕高丽”。是年,宋辽签订澶渊之盟,高丽特遣使庆贺,故同书卷十四又载:廿三年“五月……丙寅,高丽以与宋和,遣使来贺”。

十三、“二十六年,进龙须草席,及贺中京城”。

按:“城”,《辽史》卷十四《圣宗纪五》作“成”,事在其年五月。中京,辽五京之一。《辽史》卷三十七《地理志一》载:“太宗以皇都为上京,升幽州为南京,改南京为东京,圣宗城中京,兴宗升云州为西京,于是五京备焉。”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以西之大明城为其遗址。

十四、“二十七年,承天皇太后崩,遣使报以国哀。二十八年,诵遣魏守愚等来祭,三月,使来会葬”。

按:承天皇太后,《辽史》卷七一有传。据《辽史》卷十五《圣宗纪六》载:二十八年(1010年)“二月,……己亥,高丽遣魏守愚等来致祭”。“三月……宋、高丽遣使来会葬”。

十五、〔廿八年〕“五月,高丽西京留守康肇弑其主诵,擅立诵从兄询”。

按:“康肇”,《高丽史》作“康兆”,当为一人。据《高丽史》卷三载:穆宗十二年(辽统和廿七年,1005年)元月,“西京都巡检使康兆领甲卒而至,遂谋废立”,二月,奉大良院君询即位,是为显宗大王。遂废王诵为让国公,寻又弑之。又据同书卷四载:显宗即位,以康兆为中台使,并“遣司农卿王日卿如契丹告哀称嗣”。又,《辽史》本传称“询”为“诵”

“从兄”，实误。据《高丽史》卷四载：“显宗元文大王讳询，字安世，安宗之子……成宗十一年（辽统和十年，992年）七月壬辰生”，而据同书卷三载：“穆宗宣让大王讳诵，字孝仲，景宗长子……景宗五年（辽乾亨二年，980年）庚辰五月壬戌生。成宗即位，养于宫中，……十六年（辽统和十五年，997年）十月戊午，受内禅即位。”其时询方六岁，而诵则已十八矣。《宋史》卷四八七《高丽传》载：“诵卒，弟询权知国事。”徐兢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、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记事均作“诵卒，其弟询权领国事”。故王询实为王诵之从弟也。

十六、〔二十八年〕“八月，圣宗自将伐高丽，报宋。遣引进使韩杞宣问询”。

按：《辽史》卷十五《圣宗纪六》载：统和二十八年（高丽显宗元年，1010年）“五月……丙午，高丽西京守留康肇（兆）弑其主诵，擅立诵从兄询。诏诸道缮甲兵，以备东征”。“秋八月丁卯，自将伐高丽，遣使报宋”。又“以皇弟楚国王隆佑留守京师，北府宰相、驸马都尉萧排押为都统，北面林牙僧奴为都监”，准备东征。据《长编》卷七十四大中祥符三年（辽统和廿八年）冬十月辛亥条证事谓：“雄州言、契丹涿州移牒言：‘本国将征高丽，遣右监门卫将军耶律宁奉书来告。’”《宋会要辑稿·藩夷二·辽下》亦载：“契丹以本国将征高丽，遣右监门卫大将军耶律宁奉书来告。”将出兵前，先后两次遣使高丽，据《高丽史》卷四载：显宗元年“秋七月戊寅朔，契丹遣给事中梁柄、大将军耶律允来问前王之故”，又载：“冬十月……癸丑，契丹遣给事中高正、阁门引进使韩杞来告兴师”。《辽史》本传仅载：“遣引进使韩杞宣问询”，《辽史》卷十五《圣宗纪六》亦载：“九月……辛卯，遣枢密直学士高正、引进使韩杞宣问高丽王询”，均不载统和廿八年秋七月，遣梁柄、耶律允使高

丽宣问之事。又，《高丽史》谓高正、韩杞使命为“来告兴师”，而《辽史》本传及《圣宗纪六》皆作“宣问询”，当从《高丽史》为是。

十七、〔二十八年〕“十一月，大军渡鸭绿江，康肇拒战于铜州，败之。肇复出，右皮宝详稳耶律敌鲁擒肇等，追奔数十里，获所弃粮餉，铠仗，铜、霍、贵、宁等州皆降”。

按：关于辽圣宗亲率大军东征高丽的原因，《辽史》本传及《圣宗纪六》皆作“高丽西京留守康肇弑其主诵”，“擅立诵弟询”之故。陈述主编《全辽文》卷一《将伐康肇谕群臣诏》亦载：“高丽康肇弑君，大逆也，宜发兵问罪”。然同书卷一《致高丽问罪书》又有“东结构于女真，西往来于宋国，是欲何谋？”的责问。盖其时女真分为鸭绿江女真、长白山女真和曷懒甸女真等，散处非一，《高丽史》称为“西女真”、“东女真”是也，于辽丽间叛服无常。据《高丽史》卷四载，显宗大王询元年五月，尚书左司郎中河拱辰尝击东女真，见败，“会女真九十五人来朝，至和州馆”，和州防御郎中柳宗“尽杀之”。女真将此事诉于契丹，辽圣宗遂决计亲征高丽，对高丽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入侵。就高丽而言，康肇弑其主穆宗诵，擅立其弟显宗询，应为高丽内政，且据《高丽史》卷四又载，询即位后，即“遣司农卿王日卿如契丹告哀称嗣”，又“遣借工部侍郎李有恒如契丹贺太后生辰”，通聘礼数不缺，契丹所谓“问罪”，实为进一步迫使高丽臣服之借口。日本学者池内宏谓圣宗亲征的目的，是要迫使高丽王询亲朝（参见《朝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》第七册），然亦似嫌证据不足。高丽王询，一方面仍遣使契丹，并请罢兵，如《辽史》本传载：“询奉表乞罢师，不许。”《高丽史》卷四又载，显宗大王询元年“九月，遣左司员外郎金延保如契丹秋季问候，左司郎中王佐暹，将作丞白日昇如契丹东京修好”。另一方面，高丽亦积极备战，于同年十月“以参知政事康兆为行营都统使……

率兵三十万军于通州，以备契丹”。是年十一月，辽圣宗亲率四十万大军由显州进兵，《长编》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冬十月戊辰条载：“知雄州李允则言：‘契丹由显州东侵高丽，期以十二月还中京。’”又云：“今契丹趋辽阳，伐高丽”。故知契丹由显州进兵，直趋辽阳，渡鸭绿江。《高丽史》卷四载：是年“十一月……辛卯，契丹主自将步骑四十万渡鸭绿江，围兴化镇”，并四次招谕兴化镇士民，《东国通鉴》及《高丽史》卷九四《杨规传》载诏书内容为：“朕以前王诵，绍其祖服事朝廷，其来久矣。今逆臣康兆弑君立幼，故亲率精兵，已临国境。汝等禽康兆送驾前，便及回兵，不然，直入开京，杀汝妻孥”。然兴化镇守将“杨规、李守和等固守不降”。辽圣宗无奈，不得不分兵麟州南和通州。据《高丽史》卷九四《杨规传》载《谕高丽兴化镇勅》云：“汝等慰安百姓而待之。以二十万兵屯于麟州南无老代（山名，今朝鲜正州东南西麟洞附近），以二十万兵进至通州。”对于契丹的大举进攻，高丽权臣康肇分三部拒战，据《辽史》卷八八《耶律盆奴传》载：“二十八年，驾征高丽，盆奴为先锋，至铜州，高丽将康肇分为三以抗我军，一营于州西，据三水之会，肇居其中；一营近州之山；一附城而营。盆奴率耶律弘古击破三水营，擒肇，李玄蕴等望风溃。”这里有两个问题，1.擒康肇的辽军将领，《辽史》本传及卷十五《圣宗纪六》均作“耶律敌鲁”，而《辽史》卷八八《耶律盆奴传》则作“耶律盆奴”和“耶律弘古”，同卷《耶律弘古传》亦谓：“后伐高丽，副先锋耶律盆奴，擒康肇于铜州。”唯同书卷八八《耶律的录传》又称：“统和廿八年，伐高丽。的录率本部军与盆奴等擒康肇、李玄蕴于铜州。”考《辽史》本传之“耶律敌鲁”当即“耶律的录”，实音同而字异也。然比较上述记载，可知擒康肇者，决非耶律敌鲁一人，《辽史》本传阙载。2.擒康肇的地点，《辽史》纪、传皆作“铜州”，唯《高丽史》作“通州”。据《高丽史》

卷四载：显宗元年“十一月……己亥，康兆（肇）与契丹战于通州，败绩，就擒”。“庚戌，丹兵陷郭州”。日人池内宏将“铜州”比定为“通州”，惜其未作考订。兹考《高丽史》卷五八《地理志三》宣州条载：“宣州，本安化郡，高丽初改为通州，显宗廿一年称宣州防御使。”其地即今朝鲜平安北道宣川西北的东林。又据《辽史》卷三八《地理志二》载“铜州，广利军，刺史。渤海置，统县一：析木县……初隶东京，后来属”。又，《奉天通志》卷五四载：“渤海有铜州，辽徙置于今海城东，以旧属辽阳府之析木县隶之。”其地当今辽宁海城县南四十里之析木城，与《高丽史》之“通州”相距甚远。此外，通州在鸭绿江东，盖辽圣宗率军渡鸭绿江后，进围兴化镇，不克，乃分兵麟州南无老代和通州，其地均在辽统和十一年所赐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境内，高丽先后筑兴化、铁州、通州、龙州、龟州、郭州六城以防御契丹，故辽军擒康肇的地点，必在鸭绿江以东之“通州”，而非辽境内之“铜州”，《辽史》实误。

十八、“询上表请朝，许之。禁军士俘掠”。

按：据《高丽史》卷四载：显宗元年“十一月……甲戌，次杨州（今韩国汉城）。遣河拱辰及户部员外郎高英起奉表往丹营请和”。又，《辽史》卷八八《耶律瑶质传》谓：“王询乞降，群臣议皆谓宜纳。瑶质曰：‘王询始一战而败，遽求纳款，此诈耳。纳之，恐堕其奸计。待其势穷力屈，纳之未晚。’已而询果遁。”王询上表请朝，实为后来辽圣宗班师的重要原因。（参见池内宏《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》第七册）

十九、“守将卓思正杀我使者韩喜孙等十人，领兵出拒，保佑等复还，乙凛领兵击之，思正遂奔西京，围之五日，不克。驻蹕于城西佛寺”。

按：“韩喜孙”，《高丽史》卷九四《智蔡文传》作“韩杞”，当为一人。“西京”，今朝鲜都城平壤。《辽史》本

转载：高丽请和，辽圣宗以“政事舍人马保佑为开京留守，安州团练使王八为副留守，太子太师乙凛将骑兵一千送保佑等赴京”，然高丽守将卓思正杀辽使者拒之，故保佑等复还。又据《辽史》卷八八《高正传》载：“时高丽王询奉表请入觐，上许之，遣正率骑兵千人迓之。馆于路，为高丽将卓思正所围。正以势不可敌，与麾下壮士突围出，士卒死伤者众”，与本传记载异。又据《高丽史》卷九四载：“东北界都巡检使卓思政率兵至，遂与合军复入城。王以三军败衄，州郡陷没，上表请朝。契丹主许之，遂禁俘掠……思政以智文为先锋，出与乙凛战，乙凛、保佑败走……契丹主复遣乙凛击之。逻卒报敌兵来屯安定驿，势甚盛……遂围城，契丹主次城西佛寺。思政惧，给将军大道秀曰：‘君自东门，吾自西门出，前后夹攻，蔑不胜矣。’遂以麾下兵夜遁。”故《辽史》本传谓：“思正遂奔西京”，实为卓思正离开西京逃遁也。于是，辽军遂攻围西京，据《高丽史》卷四载：显宗元年“十一月……癸丑，丹兵至西京，焚中兴寺塔。甲寅，陷肃州”。此外，明人《朝鲜世纪》亦载：“契丹主圣宗自将锐师四十万以讨弑君之贼，执康兆，诛之。乘胜攻西京，城且陷，群臣皆议出降。姜邯赞曰：‘契丹大军远涉我重地，其势莫克久留，请避其锋，寻当自退。’王从之，南奔罗州。”《高丽史》卷四又载：“契丹主攻西京，不拔。解围而东”，“壬申夜，王与后妃避丹兵南幸”。

十九、“遣排押、盆奴攻开京，遇敌于京西，败之。询弃城遁走，遂焚开京，至清江而还”。

按：开京，亦称王京开城府，为高丽都城，今朝鲜开城市。萧排押，《辽史》卷八八有传，其记载称：“圣宗征高丽，将兵由北道进，至开京西岭，破敌兵，斩数千级。高丽王询惧，奔平州。排押入开京，大掠而还。”又，同书同卷，《耶律盆奴传》亦载：“会大军至，斩三万余级，进至开京，破敌于西岭。高丽

王询闻边城不守，遁去。盆奴入开京，焚其王宫；乃抚慰其民人”。考《高丽史》卷四载，显宗二年，（辽统和二十九年，1011年）“春正月乙亥朔，契丹主入京城，焚烧大庙、宫阙，民屋皆尽。是日，王次广州，……壬午，次长谷驿，乙酉，丹兵退……丁亥，踰芦岭，入罗州”。唯《辽史》本传称契丹兵“至清江而还”。今考清江，亦称清水江，即今朝鲜安州北之清川江。据《高丽史》卷四载：显宗元年“十一月壬子，丹兵至清水江，安北都护府使、工部侍郎朴遯弃城遁”。次日，契丹兵至西京，不拔。显宗二年正月，焚掠开京而还。是月，“癸卯，契丹主渡鸭绿江引去”。

二十、“二十九年正月，班师，所降诸城复叛。至贵州南岭谷，大雨连日，霁乃得渡，马驼皆疲乏，甲仗多遗弃。次鸭绿江，以所俘人分置诸陵庙，余赐内戚、大臣”。

按：《辽史》卷十五《圣宗纪六》所载较此略详，“贵州南岭谷”作“贵州南峻岭谷”。又称：“己丑，次鸭绿江。庚寅，皇后及皇弟楚国王隆佑迎于来远城（今辽宁丹东九连城附近）。壬辰，诏罢诸军。乙亥，次东京。”“二月己酉，谒乾、显二陵。戊午，所俘高丽人分置诸陵庙，余赐内戚、大臣”。《高丽史》卷四载：显宗二年（辽统和廿九年）“春正月……乙酉，丹兵退……壬寅，杨规、金叔兴与契丹战死。癸卯，契丹主渡鸭绿江引去”。“夏四月……辛酉，祷雨于松岳，大雨。乙丑，遣工部郎中王瞻如契丹谢班师”。关于契丹“班师”的原因，徐兢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曰：“天禧中，契丹复破高丽，杀戮其民几尽。王询至弃国而逃于蛤窟。契丹留城中，八月，会西北山万松皆作人声，始骇惧引去。”又曰：“祥符中，契丹侵逼王城，神乃夜化松数万作人语。虏疑有援，即引去。”窃以为契丹退兵原因有三，其一，由于高丽军民坚壁清野，恃险拒战，据《高丽史》卷四载：契丹军围兴化镇，守将“杨规、李守

和等固守不降”。又，上引《朝鲜世纪》载姜邯赞语，亦主张坚壁清野，以逸待劳。《辽史》卷九三《萧惠传》亦载：“高丽阻险以拒。”其二，辽军长途远征，粮草不继，后援不足，如《长编》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冬十月条谓辽军“凡调发，先下令使自办兵器，驼马、粮糗，故其抄略所得，不补所失。又尝索境内汉口有罪者配军，曰骁武，人皆嗟怨，不为用”。（参见林瑞翰著《辽代兵制》刊《大陆杂志》十七卷七期）其三，辽军所侵之地，多为鸭绿江东女真故地，故女真与高丽联兵，共拒契丹。如《契丹国志》卷七载：“统和廿八年冬十一月，契丹伐高丽国，高丽与女真合兵拒之，契丹兵败。”又上引《长编》载：“及是，契丹又大举来伐，询与女真合兵拒之，契丹大败，帐旗卒乘罕有还者，官属战没大半。”《宋会要辑稿·蕃夷三·女真》亦载：“（大中祥符）三年，契丹征高丽，道由女真，复与高丽合兵拒之。契丹大丧师而还”。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·政宣上帙三》亦载：“大中祥符”三年，契丹往伐高丽，过其国，乃与高丽合拒契丹，……契丹大败，丧师而还”。上引诸史料记载，虽互有同异，然均肯定了女真尝与高丽联兵共拒契丹这一事实。韩国学者金庠基《高丽时代史》却谓女真与高丽合兵拒契丹事为宋人误记，似嫌证据不足。盖女真时已归属高丽，从辽圣宗进军路线来看，“道由女真”实为不误，且《宋会要辑稿·蕃夷三》又谓：女真“今有首领三十，分领其众，地多良马，常至中国贸易。旧隶契丹，今归于高丽”。故女真与高丽联兵并非没有可能。日本学者池内宏谓高丽杨规军中多女真人，故宋人作如此记载。《宋会要辑稿·蕃夷二·辽下》称：“契丹国王亲督兵伐高丽，……高丽之战，兵败多不还者。”《辽史》讳言“兵败”，故称“班师”。

二十一、“开泰元年，询遣蔡忠顺来，乞称臣如旧，诏询亲朝。八月，遣田拱之奉表，称病不能朝。诏复取六州之地”。

按：高丽遣蔡忠顺来在开泰元年（显宗三年，1012年）夏四月。据《辽史》卷十五《圣宗纪六》载，开泰元年“夏四月庚子，高丽遣蔡忠顺来，乞称臣如旧，诏王询亲朝”。又载，“八月……己未，高丽王询遣田拱之奉表称病不能朝。诏复取六州地”。所谓“六州地”，据《高丽史》卷四载：显宗三年“夏四月……契丹诏王亲朝”。又载：“六月……甲子，遣刑部侍郎田拱之如契丹夏季问候，且告王病不能亲朝。丹主怒，诏取兴化、通州、龙州、铁州、郭州、龟州等六城。”故“六城”即“六州地”，为辽统和十一年所赐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女真旧地。至是，复诏取之。据《长编》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条载：“（高丽）尝筑六城于境上，曰兴州、曰铁州、曰通州、曰龙州、曰龟州、曰郭州。契丹以为贰于己，遣使求六城，询不许”，且“又于鸭绿江东筑城，与来远城相望，跨江为桥，潜兵以固六城”。由于“六城”控扼鸭绿江下流，为契丹经略女真和高丽的战略要冲，故“六城”问题遂成为辽丽交涉的焦点，也成为辽第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的直接原因。

二十二、“二年，耶律资忠使高丽取地，未几，还。三年，资忠复使，如前索地”。

按：“耶律资忠”，《辽史》卷八八有传。史称：“耶律资忠，字沃衍，小字札刺……资忠博士，工辞章，年四十未仕。圣宗知其贤，召补宿卫……初，高丽内属，取女真六部地以赐。至是，贡献不时至，诏资忠往问故。高丽无归地意。由是，权贵数短于上，出为上京副留守。三年，再使高丽，留弗遣……九年，高丽上表谢罪，始送资忠还”。《辽史》卷十五《圣宗纪六》亦载：开泰三年“二月……甲子，遣上京副留守耶律资忠复使高丽，取六州旧地”。根据上述纪、传所载，耶律资忠当于开泰二年（显宗四年）和三年（显宗五年）两次使高丽索地，第二次为高丽所拘。然据《高丽史》卷四载，契丹为索六城，共遣使高丽四

次，其中耶律资忠（《高丽史》作“行平”）出使三次，李松茂出使一次。史载：显宗四年“三月……戊申，契丹使左监门卫大将军耶律行平来责取兴化等六城”。同年“秋七月戊申，契丹使耶律行平复来索六城”。六年，“夏四月庚申，契丹使将军耶律行平来，又索六城，拘留不遣”。以《辽史》和《高丽史》相较，不仅耶律资忠（行平）使高丽的次数不同，且时间亦不一，《辽史》第一次遣使作“开泰二年”，《高丽史》作“显宗四年（开泰二年，1013年）三月”；第二次遣使，《辽史》作“开泰三年二月”，《高丽史》作“显宗四年（开泰二年）秋七月”；第三次遣使，《辽史》阙载，《高丽史》为“显宗六年（开泰四年，1015年）夏四月”。又据《高丽史》卷四载，由于耶律资忠第三次遣使被拘，故契丹又遣李松茂使高丽索六城。史称：显宗六年“九月甲寅，契丹使监门将军李松茂来索六城”，《辽史》本传阙载，宜据《高丽史》补之。

二十三、〔三年〕“五月，诏国舅详稳萧敌烈、东京留守耶律团石等造浮梁于鸭绿江、城保、宣义、定远等州”。

按：由于高丽无归“六城”意，辽圣宗便于开泰三年（显宗五年，1014年）再次下诏征伐高丽，从而，发动了对高丽第三次大规模的入侵。据《辽史》卷十五《圣宗纪六》载：开泰三年“夏，诏国舅详稳萧敌烈、东京留守耶律团石等讨高丽，造浮梁于鸭绿江、城保、宣义、定远等州”。是为契丹第三次征高丽的开始。又据《高丽史》卷四载：显宗六年“春正月，契丹作桥于鸭绿江，夹桥作东、西城。遣将攻破，不克”。故《辽史》本传将此系之于开泰三年（高丽显宗五年），实误。《高丽史》又载：

“是岁，契丹取宣化、定远二镇城之。”据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考证，契丹于鸭绿江夹桥筑东、西两城，西为来远城，东即宣义州，简称宣州。（参见《朝鲜历史地理》卷二）此外，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》（东北卷）》称：《辽史》之

“宣义州”，“定远州”，分别为《高丽史》之“宣化镇（简称宣州）”和“定远镇”，所论甚是。对于契丹在鸭绿江东筑城，高丽深感不安，并遣将攻之，企图焚毁这些城寨。据《长编》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（辽开泰四年，1015年）十一月癸酉条记事载：

（高丽）言：“契丹于其国西鸭绿江头创浮桥，又于江东筑寨，欲发兵焚毁，则虑众寡不敌，边民殊不安”。关于此次契丹萧敌烈“伐高丽”的详情，《辽史》阙载，兹据《高丽史》卷四称：显宗五年“冬十月己未，契丹遣国舅详稳萧敌烈来侵通州，兴化镇将军郑神勇、别将周演击败之，斩七百余级，溺江死者甚众”。六年“春正月癸卯，契丹兵围兴化镇，将军高积余、赵弋等击却之。甲辰，又侵通州”。“己亥，契丹侵龙州”。九月“己未，契丹来征通州，癸亥，兴化镇大将军郑神勇、别将周演、散员任忆、校尉杨春、太医丞孙简、太史丞康承颖等引兵出契丹军后，击杀七百余级，神勇及六人死之”。“丁卯，契丹攻宁州城，不克而退”。契丹企图以武力夺取六城的图谋遂成泡影。

二十四、“四年，命北府宰相刘慎行为都统，枢密使耶律世良为副，殿前都点检萧虚烈为都监。慎行挈家边上，致缓师期，追还之。以世良、虚烈总兵伐高丽”。

按：萧敌烈征高丽无功而返，辽圣宗于开泰四年（显宗六年）继续以耶律世良、萧虚烈为总兵征伐高丽。据《辽史》卷九四《耶律世良传》载：开泰“四年，伐高丽，为副部署。都统刘慎行逗留失期，执还京师。世良进兵，明年，至北都护府（即安北都护府，今朝鲜安州），破追兵于郭州”。《高丽史》卷四亦载：显宗七年（开泰五年，1016年）“春正月庚戌，契丹耶律世良，萧屈烈侵郭州，我军与战，死者数万人，获辎重而归”。此“萧屈烈”当即《辽史》之“萧虚烈”，是役的时间、地点完全一致。

二十五、“六年，枢密使萧合卓为都统，汉人行宫都部署王

继忠为副，殿前都点检萧虚烈为都监进讨。萧合卓攻兴化军，不克，师还”。

按《辽史》卷十五《圣宗纪六》载：开泰“六年，……五月戊戌朔，命枢密使萧合卓为都统……翌日，赐合卓剑，俾得专杀”。

《高丽史》卷四载：显宗八年“八月……癸巳，契丹萧合卓围兴化镇，攻之九日，不克。将军坚一洪、光高义出战，大败之，斩获甚多”。此次征伐，契丹又大败而返。

二十六、“七年诏东平郡王萧排押为都统，萧虚烈为副统，东京留守耶律八哥为都监复伐高丽。十二月，萧排押与战茶、陀二河之间，我军不利”。

按：《辽史》卷八八《萧排押传》载：开泰“七年，再伐高丽，至开京，敌奔溃，纵兵俘掠而还。渡茶、陀二河，敌夹射，排押委甲仗走，坐是免官。”《辽史》卷八十《耶律八哥传》亦载：开泰“七年，上命东平王萧排押帅师伐高丽，八哥为都监。至开京，大掠而还。济茶、陀二河，高丽追兵至。诸将皆欲使敌渡两河击之，独八哥以为不可曰：‘敌若渡两河，必殊死战，乃危道也，不若击于两河之间。’排押从之。战，败绩”。又据《高丽史》卷四载：显宗九年“十二月……戊戌，契丹萧逊宁以兵十万来侵，王以平章事姜邯赞为上元帅，大将军姜民瞻副之，帅兵至兴化镇，大败之。逊宁引兵直趋京城，民瞻追及于慈州，又大败之。”同书卷九四《姜邯赞传》亦载：“选骑兵万二千，伏山谷中。以大绳贯牛皮，塞城东大川以待之。贼至，决塞伏发，大败之”。所谓“城东大川”，今为自北向南流经兴化镇的三桥川。又载：“十年（开泰八年，1019年）春正月辛酉，萧逊宁至新恩县，去京城百里。王命收城外民户入内，清野以待。逊宁遣耶律好德赍书至通德，收告以回军，潜遣候骑三百余至金郊驿，我遣兵一百，乘夜掩杀之。”又，“二月己丑朔，丹兵过龟州，邯赞等邀战，大败之，生还者仅数千人”，龟州之役，为契丹入

侵高丽以来所遭受的最大的失败，同书《姜邯赞传》又载：“契丹兵过龟州，邯赞等邀战于东郊，两军相持，胜败未决。（金）宗铉引兵赴之，忽风雨南来，旌旗北指，我军乘势奋击，勇气自倍。契丹兵奔北，我军追及之，涉石川，至于盘岭，僵尸蔽野，俘获人口、马驼、甲兵仗不可胜数，生还者仅数千人，契丹之败，未有如此之甚。”惟《辽史》本传所称“茶、陀二河”，据日本学者池内宏考证，应为《高丽史》卷九四《姜邯赞传》所指的“石川”，亦即流经龟城的皇华川（参见《朝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》第七册）。又考《高丽史》之“萧逊宁”应为《辽史》本传之“萧排押”，萧逊宁乃排押弟。据《辽史》卷八八《萧排押传》称：“萧恒德，字逊宁”，又曰：“弟恒德”，为辽统和十年征伐高丽的统帅。故《高丽史》实误。至此，契丹以“六城”问题对高丽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入侵，历时六年，数易将帅，仍以契丹在军事上的失败而告终。

二十七、“八年，诏数排押讨高丽罪，释之”。

按：《辽史》卷十六《圣宗纪七》载：八年“三月乙亥，东平王萧韩宁、东京留守耶律八哥、国舅平章事萧排押、林牙要只等讨高丽还，坐失律，数其罪而释之”。考《辽史》本传卷八八《萧排押传》，均谓“东平王萧排押”，又据《辽史》卷八一《欧里斯传》亦谓：“开泰初，……迁右皮室详稳，将本部兵，从东平王萧排押伐高丽，至茶、陀二河，战不利”。故《辽史·圣宗纪七》“东平王萧韩宁”当为“萧排押”之误，下文“国舅平章事萧排押”为复文，当删去。又，责萧排押事，据《高丽史》卷九四《姜邯赞传》载辽圣宗《责萧逊宁（排押）诏》曰：“汝轻敌深入，以至于此。何面目见我乎？朕当皮面，然后戮之。”

二十八、“询遣使来乞贡方物。九年，资忠还，以询降表进，释询罪”。

按：《辽史》卷十六《圣宗纪七》载：八年“十二月……辛亥，高丽王询遣使乞贡方物，诏纳之”。又载：九年（显宗十一年，1020年）“五月戊午，耶律资忠使高丽还，王询表请称藩纳贡，归所留王人只刺里。只刺里在高丽六年，忠节不屈，以为林牙。辛未，遣使释王询罪，并允其请。”考“只刺里”当即“耶律资忠”，其被拘高丽事与《辽史》卷八八《耶律资忠传》所载完全一致。又谓：“资忠，小字札刺”，故“只刺里”为其异名。据毕沅《续资治通鉴》考证，两者实为一人。又据《高丽史》卷四载：显宗十一年二月“是月，遣李作仁奉表如契丹，请称藩纳贡如故，且归所拘人只刺里，被留凡六年”。然又载：“三月癸丑，归契丹使耶律行平”，此外“只刺里”和“耶律资忠”并提，恐误。又，“己未，契丹使检校司徒韩绍雍来”。是年夏四月，高丽又遣使契丹告封王子，《高丽史》卷四载：“遣礼部尚书梁绩、刑部侍郎韩去华如契丹告封王子。”至此，辽丽关系始恢复和好，双方通问不绝，契丹又正式册封询为高丽国王。据《高丽史》卷四载：显宗十三年（辽太平二年，1022年）“夏四月，契丹遣御史大夫、上将军萧怀礼等来，册王开府仪同三司，守尚书令、上柱国、高丽国王，食邑一万户，食实封一千户，仍赐车服仪物”。高丽亦于同年四月，“复行契丹年号”。

二十九、“太平元年，询薨”。

按：询薨于太平十一年。据《高丽史》卷五载：显宗廿二年（辽太平十一年、景福元年，1031年）“五月……辛未，王（询）疾笃，召太子钦嘱以后事，俄而薨于重光殿”。当从《高丽史》。

三十、“遣使来报嗣位，即遣使册王钦为王”。

按：据《高丽史》卷五载：“德宗敬康大王，讳钦，字元良，显宗长子”。显宗十四年（辽太平三年，1023年）契丹册封为“高丽国公”。又，“廿二年五月辛未，显宗薨，即位于重光殿”。又载：显宗十四年“夏四月庚子，契丹遣左散骑常侍武

白、耶律克恭等来册太子钦为辅国大将军、检校太师、守太保兼侍中高丽国公”。《辽史》本传称“册王钦为王”，实误。

三十一、“十一年，圣宗崩，遣使告哀。七月，使来慰奠”。

按：《辽史》卷十八《兴宗纪一》载：太平“十一年夏六月己卯，圣宗崩……甲申，遣使告哀于宋及夏、高丽”。又称：“秋七月丙午朔……高丽遣使吊慰”。又据《高丽史》卷五载：显宗廿二年“秋七月……己未，契丹报哀使、工部郎中南承颜来告圣宗崩，宣诏于显宗返魂堂”。“辛酉，王引契丹报哀使举哀于内殿”。“冬十月……遣工部郎中柳桥如契丹会葬”。辽圣宗逝世后，辽丽关系再度紧张，起因盖缘于高丽德宗请求毁弃鸭绿江城堡等，为契丹所拒，于是德宗便对契丹持强硬态度。据《高丽史》卷五载：显宗廿二年（辽景福元年）“冬十月……〔遣〕郎中金行恭贺即位，表请毁鸭绿城桥，归我被留行人”，然契丹不许。故同书又载“十一月……辛丑，金行恭回报，契丹不从所奏，遂停贺正使，仍用圣宗太平年号”。甚至还发生了拒纳契丹使的事件，《高丽史》卷五载：德宗“元年（辽重熙元年，1032年）春正月……乙酉，契丹遣留使来，至来远城，不纳。遂城朔州、宁仁镇、派川等县，备之”。次年，辽丽双方不仅通使完全中断，而且还发生了小股武装冲突。同书卷五又载，德宗“二年（辽重熙二年，1033年）春正月……左右卫猛校尉吴幸、李璜、申先立等抄掠丹兵七人，赐职一级”。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高丽德宗大王钦去世、靖宗大王亨即位后三年方才缓和。据《高丽史》卷六载：靖宗元年（辽重熙四年，1035年），契丹来远城移牒责问高丽为何断绝通好，高丽亦奉牒据理驳斥，直到靖宗三年（辽重熙六年，1037年）十二月，高丽方遣使如契丹复请通好。至此，辽丽关系亦再度缓和。

三十二、“兴宗重熙七年，来贡”。

按：《辽史》卷十八《兴宗纪一》载：七年“二月……丁

丑，高丽遣使来贡”。由于德宗大王钦对契丹持强硬态度，辽丽关系断绝。契丹鉴于数次伐高丽失败的教训，亦未敢大动干戈。德宗去世后，靖宗大王亨即位，契丹来远城尝移牒责问高丽，结果遭高丽回牒驳斥。靖宗三年，契丹来远城又宣旨牒高丽宁德镇，据《高丽史》卷六载：“高丽之国，早务倾输，近岁以来，稍闻稽阙。欲载修于职贡，合先上于表章”，并以武力相威胁，于靖宗三年十一月“以船兵侵鸭绿江”。高丽遂被迫妥协，遣使朝贡。故同书卷六又载：靖宗三年“十二月丁亥，遣殿中少监崔延嘏如契丹”，表示当“遵太后之遗言，固为藩屏；抚小邦之弊俗，虔奉阙庭。更从文轨以输诚，永效梯航而展礼”。又载：靖宗四年（辽重熙七年，1038年）夏四月，遣尚书左丞金元冲如契丹起居谢恩，仍请年号，“并进奉金吸瓶、银药瓶、幘头、纱紵布、贡平布、脑原茶、大纸、细墨、龙须蓑席等”。从而恢复了对契丹的朝贡。

三十三、“十二年三月，以加上尊号，来贺。十三年，遣使来贡”。

按：《辽史》卷十九《兴宗纪二》载：十一年（靖宗八年，1042年）“冬十一月丁亥，群臣加上尊号曰聪文圣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，册皇后萧氏曰贞懿宣慈崇圣皇后”。十二年（靖宗九年，1043年）“三月……壬辰，高丽国以加上尊号，遣使来贺”。又据《高丽史》卷六载：靖宗七年（辽重熙十年，1041年）“是岁，遣翰林学士承旨朴有仁、右丞李惟亮如契丹贺册礼，判卫尉事柳参献方物”。

三十四、〔十五年〕“八月，王钦薨，遣使来告”。

按：据《高丽史》卷五，王钦立于辽景福元年（高丽显宗廿二年，1031年），卒于辽重熙三年（高丽德宗三年，1034年），庙号德宗。是年九月，德宗弟平壤君亨即位，是为靖宗。又据《高丽史》卷六载：靖宗大王亨十二年（辽重熙十五，1046年）

“五月……丁酉，王疾弥留，……是月，薨”。故辽重熙十五年薨者当为高丽国王“亨”而非“钦”也。《辽史》本传“七月，使来慰奠”后缺载“重熙三年，王钦薨，弟亨即位”一事，“王钦薨”当厘正为“王亨薨”，“八月”，据《高丽史》当为“五月”之误。此外，《高丽史》卷七又载：“文宗章圣仁孝大王讳徽，字烛幽……（靖宗）十二年五月丁酉，靖宗薨，即位于柩前。……六月甲寅，遣尚书工部郎中崔爰俊如契丹告哀”，故《辽史》本传缺载王亨“弟徽即位”事，当补之，以明高丽传承统系。

三十五、〔十九年〕“六年，遣使来贺伐夏之捷”。

按：《辽史》卷二十《兴宗纪三》载：十九年（文宗四年，1048年）“六月……甲戌，宋遣使来贺伐夏捷，高丽使俱至”。所谓“伐夏之捷”，据《辽史》卷一一五《西夏传》所载，盖指辽重熙十八年（1049年）六月，辽兴宗亲统大军征西夏，战于贺兰山，西夏溃败，俘夏主谅祚妻及官僚家眷数人。次年三月，辽军又与西夏大战于三角川，夏军又大败，被迫向辽求和。

三十六、〔重熙〕“二十三年四月，王徽请官其子，诏加检校太尉”。

按：据《辽史》卷二十《兴宗纪三》载：廿三年“夏四月癸卯，高丽遣使来贡”。又“六月……壬寅，高丽王徽请官其子，诏加检校太尉”。又据《高丽史》卷七载：文宗大王徽八年（辽重熙廿三年，1054年）夏四月“是月，遣给事中金良贄如契丹告立太子”。盖四月高丽遣使，六月兴宗加授王徽子勋“检校太尉”。然据《高丽史》卷七又载：文宗七年（辽重熙廿二年，1053年）十一月制曰：“延德宫妃长子杰可改名勋，立为太子”。九年（辽清宁元年，1055年）“五月……癸亥，（契丹）遣利州刺史萧禄来册王太子，官告曰……王徽子勋……可特封三韩国公”，并无“诏加检校太尉”之语，俟考。

三十七、“兴宗崩，道宗即位，清宁元年八月，遣使报国哀，以先帝遗留物赐之。十一月，使来会葬”。

按：《高丽史》卷七载：文宗大王徽九年（辽重熙廿四年，1053年）“九月癸亥，契丹兴宗告哀使、鸿胪少卿张嗣复来，王闻嗣复过鸭绿江，减常膳，辍音乐，禁屠宰，断弋猎”。又曰：“乙丑，王服素襦，率百官出昌德门前，嗣复传诏举哀行服，辍朝市三日”，“丙子，遣知中枢院事崔惟善、工部侍郎李得路如契丹吊丧、会葬”。自辽道宗即位，至天祚帝败亡，辽丽双方往来不绝，或遣使册封，如清宁元年（1053年）五月，契丹遣使册高丽王徽，又，高丽向契丹告奏、回谢，献方物，或互贺生辰，正旦、祭奠、吊丧、会葬等，兹不一一赘述。

三十八、〔清宁八年〕“十二月，以佛经一藏赐徽”。

按：《高丽史》卷八载此事在高丽文宗大王徽十七年（辽清宁九年，1061年）三月，而非如本传作“咸雍八年十二月”（文宗廿六年，1070年）。《高丽史》卷八载，文宗大王徽十七年“三月丙午，契丹送《大藏经》，王备法驾迎于西郊”。考《辽史》“百衲本”原文为“〔清宁〕七年、八年来贡。十二月，以佛经一藏赐徽”，无“咸雍”年号。中华书局点校本据《辽史·道宗纪》增之，然以《辽史》本传（百衲本）与《高丽史》卷八相较，记载虽略有出入，然大抵一致，盖辽于清宁八年（高丽文宗十六年，1060年）十二月诏送高丽《大藏经》，次年（辽清宁九年、高丽文宗十七年，1061年）三月始送抵高丽。若此则《辽史》卷二十三《道宗纪三》载此事误，中华书局点校本据《辽史·道宗纪三》改订本传则益误矣。

三十九、〔大康〕“四年，王徽乞赐鸭绿江以东地，不许”。

按：所谓“鸭绿江以东地”，当指辽统和十一年圣宗诏赐女真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者。高丽既得江东地，先后筑六城等防守，然辽以高丽“贰于己”，便于开泰初数遣使高丽索还江东“六

城”，高丽王询不许，辽便对高丽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侵伐，历时六年，终为高丽所败，故江东地仍在高丽治下，并未交割于辽，此所谓“乞赐鸭绿江以东地”之说，殊令人费解。盖辽于开泰三年伐高丽时，尝于鸭绿江头创浮桥，筑宁远、宣义、保州等城寨，又于高丽显宗六年“取宣化，定远二镇城之”具见上述。此外，《高丽史》卷七又载：文宗九年（辽清宁元年）“秋七月朔，都兵马使奏：（契丹）或置城桥，或置弓口栏子，渐踰旧限……又创立邮亭蚕食”，致“边民骚骇”，引起高丽不安，乃至道宗即位伊始，高丽便致书辽东京留守，乞契丹“还前赐地，其城桥弓栏亭舍，悉令毁罢”，故高丽所请者，实为拆毁江东城寨，以防契丹蚕食其疆土而已。为此，契丹与高丽就鸭绿江东疆界事进行了交涉，据《高丽史》卷九载：文宗廿九年（辽大康元年，1073年）“秋七月……癸酉，辽东京兵马都部署奉枢密院札子，移牒请治鸭绿江以东疆域。己卯，遣知中枢密院事柳洪、尚书右丞李同鉴，同辽使审定地分，未定而还”。故辽丽交涉疆界事未果。

四十、“九年八月，王徽薨，以徽子三韩国公勋权知国事。十二月，勋薨”。

按：据《高丽史》卷九载：文宗三十七年（辽大康九年、1081年）“秋七月……辛酉，王疾笃……遂薨于重光殿”。又载：“顺宗宣惠大王，讳勋，字义恭……八年二月册为王太子。三十七年七月辛酉，文宗薨，奉遗诏即位”，并“遣知制诰吴仁俊如辽告哀”。故王徽薨于“七月”，《辽史》本传作“八月”误。又据《高丽史》同卷载：是年“冬十月……甲申，制加王弟运守太师兼中书令，食实封一千户。王小有疾，居庐哀毁，疾益笃。乙未，命母弟国原公运权总国事。……是日，薨”。故勋薨于“冬十月”，本传作“十二月，勋薨”，亦误。

四十一、“大安元年，删勋子运为国王，二年，遣使来谢封册”。

按：据《辽史》卷二十四《道宗纪四》载：大安元年（高丽宣宗二年，1083年）“十一月……丙辰，遣使册三韩国公王勋弟运为高丽国王”，又上引《高丽史》卷九谓：“冬十月……乙未，命母弟国原公运权总国事”。故“运”为“勋”弟而非其子，本传误。又据《高丽史》卷十载，宣宗大王运二年（辽大安元年）“十一月……癸丑，辽遣保静军节度萧璋、崇禄卿温峤等来册王为特进、检校太师兼中书令、上柱国，食邑一万户，食实封一千户兼赐冠冕车马圭印衣带綵缎等物。己未，王受册于南郊”。次年“五月……丙子，遣尚书礼部侍郎崔洪嗣如辽谢落起复，礼宾卿李资智贺正，知中枢院事李子威、尚书左丞黄宗慤谢册命。又遣告奏使尚书右丞韩莹，时辽欲于鸭绿江将起樵场，故请罢之”。

四十二、“十年，运薨。子昱遣使来告，即赙赠”。

按：据《高丽史》卷十载：宣宗十一年（辽大安十年，1092年）夏“闰四月壬辰，王不豫……五月壬寅，王薨于延英殿”。又载“献宗恭殇大王讳昱，宣宗元子……十一年五月壬寅，宣宗薨，奉遗命即位于重光殿”。同年“十二月，辽勅祭使萧遵烈，副使梁祖述、慰问使萧褫，起复使郭人文等来”，“慰问使传诏于乾德殿，……兼赐赙赠”。

四十三、“寿隆元年，来贡。十一月，王昱病，命其子颙权知国事”。

按：“寿隆”应作“寿昌”，前人考之甚详，兹不赘。又，王颙为王昱叔父，非其子也。据《高丽史》卷十一载：“肃宗明孝大王讳颙，字无常，古讳熙，文宗第三子，顺宗母弟”，又上引文谓：“献宗，……宣宗元子”，而宣宗则据《高丽史》卷十为“文宗第二子，顺宗母弟”。此外，王颙于“文宗八年甲午七月己丑生”，而献宗大王昱则为“宣宗元年六月乙未生”。故“王颙”年长于“王昱”达三十一岁，本传以“颙”为“昱”子，实

误。又，王颙即位系王昱“禅让”，据《高丽史》卷十一载：献宗元年“十月己巳，献宗下制禅位，王谦让再三，庚午，即位于重光殿”。

四十四、“六年，封颙为三韩国公”。

按：据《高丽史》卷十一载：肃宗二年（辽寿昌三年，1095年）十二月“癸巳，辽遣耶律思齐、李湘来赐玉册、圭印、冠冕、车辂、章服、鞍马、匹缎等物”，并“备礼册命尔特进，检校太尉兼中书令、上柱国、高丽国王，食邑一千户，食实封七百户”。又载：四年（辽寿昌五年，1097年）“冬十月……辛亥，告奏兼密进使文翼如辽，请赐元子册命”，五年（辽寿昌六年，1098年）

“五月……壬午，辽遣张臣言来谕册命元子，王备仪仗迎于太初门内。……冬十月……壬子，辽遣萧好古、高士宁来册王太子，勅曰：‘……卿长子俟……为顺义军节度、朔武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、崇禄大夫、检校太傅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使持节朔州诸军事、行朔州刺史、上柱国、三韩国公、食邑三千户、食实封五百户。’”故本传称：“封颙为三韩国公”当作“封颙长子俟为三韩国公”。

四十五、“七年 道宗崩，天祚即位，改为乾统元年，报道宗哀，使来慰奠。十二月，遣使来贺”。

按：据《高丽史》卷十一载：肃宗大王颙六年（辽乾统元年，1099年）“三月……辽遣检校右散骑常侍耶律穀来告道宗崩，皇太孙燕国公延禧嗣位”，又载：“夏四月，……遣太府少卿王公胤、阁门使鲁作公如辽吊慰、会葬”，同年“九月……戊寅，遣同知枢密院事郭尚、尚书左丞许庆如辽贺即位”。本传作“十二月”，当为高丽使到达的时间。

四十六、“五年，三韩国公颙薨，子俟遣使来告。八年，封俟为三韩国公，赠其父颙为国王”。

按：中华书局点校本《辽史》卷二十七《校勘记》〔七〕

谓：“《高丽史》卷一一，寿昌三年，已封颺为高丽王，六年，已封俟为三韩国公。又卷一二，“六年二月，辽遣使册俟为高丽王，颺无追封之事”。甚是。

四十七、“十年，乞兵于高丽以御金，而金人责之。至是，辽国亡矣”。

按：《辽史》卷二十八《天祚皇帝二》载：〔乾统〕“十年（高丽睿宗五年，1108年）春二月，……金复遣乌林答赞谟持书及册文副本以来，仍责乞兵于高丽。”金为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，辽天庆四年（高丽睿宗九年，1114年），阿骨打起兵反辽，次年（金收国元年，辽天庆五年，高丽睿宗十年，1115年），阿骨打称帝，立国号“大金”，以会宁为都城，并于同年九月攻占辽北方重镇黄龙府（吉林农安）。因此，天祚帝不得不下诏亲征并遣使赴高丽，请高丽出兵相助，据《高丽史》卷十四载：睿宗十年（辽天庆五年，1115年）“八月……辽将伐女真，遣使来请兵”，又载：“十一月……甲申，辽遣利州管内观察使耶律义、大理少卿孙良谋来督发兵”。然高丽“卒无定议”，乃至辽使耶律义“不成礼而退”。故高丽并未出兵。同书又载：十一年“三月乙未朔，王闻辽来远、抱州二城为女真所攻，城中食尽，遣都兵马录事邵亿送米一千石”，结果“来远统军辞不受”。高丽见辽势将亡，也不再稟用辽正朔、纪年，据《高丽史》卷十四载：睿宗十一年（辽天庆六年，1116年）“三月……辛未，中书门下奏辽为女真所侵，有危亡之势，所稟正朔不可行。自今公私文字宜除去天庆年号，但用甲子。从之”。又载：是年金主阿骨打遣使阿只赴高丽，高丽亦遣使如金，请金主还其抱州城，曰：“抱州本吾旧地，愿以见还。”金主谓使者曰：“尔其自取之。”十二年（辽天庆七年，1117年）三月，金兵攻取辽开州，遂袭来远城。来远城统军耶律宁粮尽援绝，遂泛海遁，以来远、抱州二城归高丽。史称：〔高丽〕“王大悦，改抱州为义州防御使，以鸭绿江为

界，置关防”。此后，辽丽虽互有报聘，然据《高丽史》卷十四载，多“因道途阻碍，难通贡贺”。乃至仁宗即位后，辽丽通聘断绝。据《高丽史》卷十五载：仁宗元年（辽保大三年，1123年）“八月……遣河则宝如辽，自龙州泛海，不达而还”。三年（辽保大五年，1125年）辽为金所灭。次年（金天会四年，高丽仁宗四年，1126年）四月，高丽遣使向金上表称臣。据《高丽史》卷十五载：仁宗大王楷四年“夏四月……丁未，遣郑应文、李侯如金称臣上表”。至此，高丽对辽的朝贡关系转而为对金的臣服关系所代替，辽丽关系历时二百零三年（辽太祖九年，922—1125年）遂告终结。

作者单位：南京大学历史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耿素丽）